

回到现实

环境与人类需要

〔美〕埃里克·富·麦克唐纳 著

石油工业出版社

回 到 现 实

环境与人类需要

〔美〕埃里克·普·爱克霍姆 著
朱跃强 吴子锦 译 王翊亭 校

石 油 工 业 出 版 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对保护全球环境中取得的成功和遭到的失败，提出了新的有影响的看法。

全书共分三个部分十一章。对全球与人类的现状，包括人口、健康、耕地、森林、海洋、大气、野生生物、人类保护等的现状、前景及其对策，作了全面论述。

可供环境决策人员、广大环境工作者和关心环境的同志参考。

Erik P. Eckholm
DOWN TO EARTH

ENVIRONMENT AND HUMAN NEEDS

Copyright ©1982 by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New York. London, 1982

*

回 到 现 实

环境与人类需要

〔美〕埃里克·普·爱克霍姆 著
朱跃强 吴子锦 译 王翊亭 校

•

石油工业出版社出版

(北京安定门外外馆东后街甲36号)

北京顺义燕华营印刷厂排版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⁵/₈印张 167千字 印1—7,100

1984年11月北京第1版 1984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15037·2(30 定价: 1.20元

译者的话

《回到现实——环境与人类需要》一书是纪念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十周年的专著，也可说是《只有一个地球》出版十年后的续篇。

本书为了说明十年来全球的环境状况，以及在保护环境的斗争中取得的经验和教训，列举了大量的事实和数据，引用了许多调查资料和评论，既分别地论述了各方面的环境问题，又全面地揭示了有关因素相互作用、互为因果的关系；既介绍了十年来在环保工作中的成败，又阐明了十年来在环境观点上的变化。并且，书中还多处论及我国的情况，特别谈到我国有关计划生育的政策和措施并加以赞扬。所有这些，不论对了解全球的环境概貌，还是对交流情况、沟通看法，都是值得一读的。

从环境与人类的关系来看，环境保护不能不涉及社会科学方面的许多问题。《回到现实——环境与人类需要》在论述许多环境问题时，都贯穿了这样的观点：如果不进行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来改善穷人的生活，则环境问题不可能得到最终的解决。所以作者要求：“从事环境保护工作的人也必须为争取一个比较公正的社会秩序而工作。”然而，究竟应该如何改革，采取什么具体的措施，更深的社会根源是什么，真正的出路在哪里？对于这些，遗憾的是，由于作者的局限，并没有作出明确答案或根本就没有涉及。作者责问：为什么“这个世界不能每天筹措八千万美元，给所有的人提供洁净的饮用水，而每天却在军备上花费十四亿美元。”谴责了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并与环境问题联系起来。但作者也非难

了第三世界为保卫自己的国家购买武器，将此与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相提并论，则是不能苟同的。

由于本书的内容涉及面广 译者水平有限，翻译上的错误或欠妥之处在所难免，请读者指正。

目 录

序.....	(1)
前言.....	(4)
1. 引言:斯德哥尔摩会议后十年来全球的环境状况.....	(10)
I 人类的状况.....	(20)
2. 世界的下层阶级.....	(20)
3. 人口因素.....	(43)
4. 健康与人类环境.....	(56)
II 自然条件与人为条件.....	(75)
5. 海洋状况.....	(75)
6. 污染:旧的方面与新的方面.....	(101)
7. 全球的大气.....	(123)
8. 耕地与荒地.....	(144)
9. 砍伐森林与给地球重新造林.....	(163)
10. 生物的多样性与经济发展.....	(192)
III 进步的条件.....	(212)
11. 人类的保护.....	(212)

序

1980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署长莫斯塔法·克·托尔巴博士邀请巴巴拉·沃德为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著名的斯德哥尔摩会议）十周年写一本书；巴巴拉·沃德曾为该会议与雷内·杜博斯合写了《只有一个地球》这本书，提供背景材料，并获得高度的好评。由于身患重病，巴巴拉·沃德邀请我和她一道从事这项工作。于是，我们一起制定了《回到现实—环境与人类需要》一书总的写法，但由于健康的日趋恶化，使她未能把更多的力量投入原稿的写作上。在托尔巴博士的鼓励下，我一人继续写下去。在巴巴拉·沃德于1981年5月31日逝世前不久，由她口述了这本书的前言。

这本书的调研工作是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资助的，但它并非官方文件；书中所表达的都是我个人的观点。需要更详细的技术资料的读者，可参考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关于环境状况的新报告《1972~1982年世界环境》（由马丁·伍·霍尔盖特、穆罕默德·卡萨斯和吉尔伯特·弗·怀特编辑，爱尔兰都柏林“蒂库利国际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我非常感谢霍尔盖特博士、卡萨斯博士和怀特博士对本书提出的意见，特别是霍尔盖特博士细致的审定，使原稿得到改进。我还必须感谢托尔巴博士、彼德·撒切尔以及他们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同事们，对初稿文作了非官方的评论。不过这本书的内容还是由我独自负责。

阿尼耳·埃加沃、约翰·贝丁汤、贾斯廷·库克、科妮莉亚·杜兰特、约翰·加兰德、卡罗耳·卡拉西克、罗伯特·卢克、迈克耳·姆高尼格耳、巴巴拉·米切耳、黛安娜·佩奇、戴维·拉恩纳耳斯、戴维·萨特韦特和安东尼·西格对原稿部分章节作了审查。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在我作为由巴巴拉·沃德长期指导的研究和辩护组织——国际环境和发展研究所的短期来访研究员时，我写下了《回到现实—环境与人类需要》这本书。国际环境和发展研究所在伦敦和华盛顿的工作人员都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并提供了一个适宜的有益环境。

我要特别感谢国际环境和发展研究所的新闻资料服务处——地球观测（Earthscan）的主任乔恩·廷克。他处理这一写作计划的合同事宜，而更重要的是，他是不可多得的对话者和编辑。本书几乎每一章节都留下他的智慧的痕迹。

我要感谢詹姆斯和凯思琳·比肖普、约翰·赫尔曼斯、弗兰克·布勒钦、罗伯特·温特博坦、克里斯·雷伊、罗布·比厄里加德、肯特·雷德福特以及其他许多人（人数太多，在此不能一一列举），在我访问尼日尔、上沃尔特和巴西期间给我的帮助。

安迪·斯坦熟练地备妥了大部分的打字稿。凯茜·布朗和林恩·拉塞耳也在关键的时刻提供了值得大可感激的秘书方面的帮助。

罗伯特·卢克和黛安娜·佩奇在研究和分析问题方面，给予了很宝贵的帮助（罗伯特对5、6及7章的贡献尤为显著）。凯思琳·库里厄一再开动脑筋为本书想出一个合适的书名《回到现实—环境与人类需要》。我还得感谢世界观测研究所允许我从各种论文中摘录我在2、9及10各章引用的材

料。

最后，我要向托尔巴博士表示我的谢意，他始终乐于赞助象本书这种非官方的分析和公众教育工作。这种传统始于秘书处委托的为斯德哥尔摩会议准备的《只有一个地球》这一著作，并且自那时以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一直坚持下来。

在写作《回到现实—环境与人类需要》时，我未曾设想做到同巴巴拉·沃德一样能言善辩和博学多才，但我却曾尽力忠于她对于一个比较公正和人道的世界的梦想。她那水晶般的道德观念决不会泯灭，将与世共存。

前 言

巴巴拉·沃德

1972年6月，世界各国政府的代表云集斯德哥尔摩，参加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自那时以来的十年间，我们对地球上生命得以存在的那很小的领域中异常的相互依赖性和脆弱性，已逐渐有所了解。我们和其它生物所赖以生存的整个生物圈，实际上只是由薄薄几米厚的土壤、几英里高的天空和几英里深的海洋所构成的。

在这个小小的领域里，一个洲的海上废物会给远处海滨造成海洋污染；某一工业联合企业排放的有毒烟雾，会在几百英里外成为酸雨降下来，使湖泊和河流沾污。几个贪得无厌的国家，可过度捕捞海产，剥夺全人类的有价值的食品。第三世界许多地区的穷苦人家，不顾一切地开垦荒地和滥伐木柴，导致森林毁坏，土壤侵蚀、洪水泛滥和旱灾接踵而来。

回顾起来，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会议也许本不应只是一个转折点。我们这些参加会议的人都经历了一阵激动和兴奋，激发起一种终于使我们行动起来的感情。但这种势头很快就减弱了。

在斯德哥尔摩会议之后，于七十年代召开的一系列联合国会议，都有一个共同的格式，即各国政府都同意问题的性质和解决的方法，但很少说到做到、言行一致。

就日益增多的环境问题而言，困难不在于找出治理的方法，因为治理的方法如今已很了解，问题的根源在于社会和

经济——归根到底在政治结构。林务员知道如何植树造林，但不知道怎样想出方法来使在印度、安第斯山脉或萨赫勒的村民能够管理好自己的种植园。生物学家知道该在哪里划出自然保护区的界限，但不能禁止缺乏土地的农民闯入保护区耕种粮食或砍伐木柴。人们日益认识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与土地占有权和经济对策的改革有关，并且牵涉到不同种族由他们自己的历史形成的生活方式。

在所有比喻中最令人伤心的，莫过于吃种子粮这个比喻了。然而人口对有限的环境及其资源所加的无情压力，此刻正在迫使几亿人民去做的正是这一点：他们把牛粪当柴烧而不是用来肥田，他们在山腰陡坡耕种，直到把宝贵的沃土冲到河里为止。

在斯德哥尔摩会议上，中国代表第一次使用的一句话最为强烈地打动了我，这句话后来写进正式的斯德哥尔摩宣言中，这就是：“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

在斯德哥尔摩会议以前，人们经常（现在有许多人仍然这样）把环境看成是某种与人类完全无关的东西。对他们来话，唯一真正的环境就是荒野的地区，在那里所有的人都被排除在外——当然，那些富裕到足以把所有别的人排除在外的富人则是例外。斯德哥尔摩会议显示了我们环境的思考重点有了根本的改变。把这个会议称为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是很恰当的。

不管我们怎样力图把自己看成是分开的、独立自主的实体，但自然界本身还是使我们想起人类是基本的统一体。这种统一体的幻想，是那么多伟大的哲学家们都有过的，而且对所有伟大的宗教都是如此重要的，如今已被认为是一种必然要出现的科学事实。给我们地球建立能够表达这种见解的

统一和合作的制度，能够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吗？由于我们在发现自然系统脆弱性的几十年间，同时在发明核武器中也发明了一种能把我们自己连同环境一起摧毁的手段，因此，上述这种需要就变得更加迫切了。

在斯德哥尔摩会议后的七十年代里，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人类在世界某一处和在别处的所作所为，其间都存在着基本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斯德哥尔摩会议的伟大成就之一，就是深入了解这种相互的联系，这一点集中地反映在“只有一个地球”这个会议口号中，从而开始出现一种共同管理好我们这个共有的星球家庭的意识。

如今在八十年代，一些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开始抛弃共同乘坐地球这艘宇宙飞船航行的观念，并把环境或南方国家当作“空想的社会改良主义”而不给予任何关心。他们似乎把宇宙看成是可消耗的——只要他们的那一小天地不波耗尽就行。

为了援助第三世界，施舍救济品是简单幼稚的想法；它表达了一种渺小的、远非斯德哥尔摩会议的“只有一个地球”的幻想，即对到处都是不值得救济而拼命想攫取他人钱包的人们的世界，它是一种吝啬、胸襟狭窄的观点。这与有些西方国家中甚至连本国穷人和下层社会（而这些人于印度农村的赤贫或雅加达、墨西哥城和拉各斯的贫民区及简陋居住区比较起来，其富裕程度又几乎总是难以令人置信的）都不理睬的害怕心理是分不开的。

在战后头几年里，美国人曾通过马歇尔计划，慷慨地提供资源和倾注他们的关怀，帮助重建受破坏的欧洲。那种慷慨大方和八十年代初北方国家的集体吝啬之间的差距，使人们怀疑是不是我们现在又忘记了越南的现实后果——即对任

何一种国际合作的行动都感到极度失望，转而退到赤裸裸的愤世嫉俗的民族主义上去。

由于在七十年代全球互相依赖的思想有了发展，所以，同样对这种趋势的反抗也在发展。过去几年，可以看出，人们对一切都依赖别人或别国的想法越来越不满。这种不满与意识形态无关，因为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在北方国家还是在南方国家，都可以觉察到这种情绪。

我们不应对这种向着更狭隘的民族主义倒退的现象感到惊讶。大国从来就不愿听命于小国。到需要对全球公有的、维持人类生命的海洋、大气、森林、河流和雨水等进行控制时，地方的压力往往比任何正在出现的国际赞助者更为强大。恐怕这就是今天的现实吧。

这种反全球性觉醒的倒退倾向，是否只是一种暂时的挫折？在我比较悲观的时刻，我担心在近几年的潮流中可能已出现真正的变化。但我们不应忘记，民族主义本身成为统治世界的力量，需要花费好几个世纪的时间。在一千年或更长的时间之后，西方的宗教改革、意识形态和信仰才能成为主要的力量。

民族主义是一种难于取代的顽固的政治势力。在整个二十世纪，我们已看到人们不愿努力改变较露骨的民族主义表现，以及对这个过程的继续抵抗。这可用来说明联合国这十年来所召开会议的情况：在这些会议上，100多个国家的代表一再投票通过关于国际行动的各种决议，但在这些决议的实施上却完全失败了。各国政府下意识地知道什么是国际的现实和在它们自己的主权利益的限制内准备接受的是什么，这二者之间存在着不寻常的紧张状态。

我们必须弄清光说不做的直接责任究竟在哪里？北美、

日本、英国和西欧其余国家，连同几个产油国的人民一起构成了世界富有国民的大部分。造成目前在资源分配上发生令人震惊的分布不均，责任就在于我们。大部分生活在西方的20%的最富有者，拥有四分之三的世界财富，而其余三十五亿我们的公民，却必需将就去享用所剩下的四分之一财富。

一个适当的环境，对世界的穷人——第三世界各国以及在这些国家中穷人的大多数——比起对富裕的西方甚至更为重要。穷人总是生活在“边际”地区附近，如今，我们全球环境的“边际”地区已比十年前斯德哥尔摩会议时更少了。

如果七十年代是联合国召开各种会议的十年，那么，宣布八十年代为国际饮用水供应和卫生的十年，也许能令人感到鼓舞。从斯德哥尔摩会议的一般认识发展到非常具体的饮用水问题——这个问题与卫生、水传播的疾病、基本的保健护理、婴儿死亡率和人口增长等都有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中，每五个小孩就有三个在儿童时期死去，而造成死亡率高的主要原因就是污染的水。只要做父母的遭遇到第一个小孩的夭折，他们就将继续给这个世界生下更多的孩子——并非出于愚蠢或无知，而是作为今天的工作负担和日后晚年的一种保障。

根据十九世纪在欧洲以及今天在亚洲部分地区的经验，我们知道，如果有了基本的保健护理、初等教育、洁净的水以及希望和工作，出生率就会开始降下来，然后趋于稳定。随着这种变化，世界不能再给人类提供食物、衣服、住房乃至一杯净水这种经常萦绕心头的恐惧，也就会开始消失。

许多种文化都有同样的信念，即水是人类基本的营养物。蓄意毒化井水的这种最可怕的污染景象，经常使人们提心吊

胆。所以，把这宣告为不合法的行动并不是偶然的。

为了给世界提供洁净的饮用水和象样的卫生设备，在未来的十年中，我们每天都要花八千万美元。这和将血液般的资源不断用于制造死亡的工具——在这上面我们每天都得花可耻的十四亿美元——比较起来是微不足道的。

直到目前为止，这种疯狂的衡量事物轻重缓急的尺度仍然是富者——北方的富国和南方的少数富人——所能接受的。我们应该感到欣慰，八十年代是从切实注意环境卫生开始的，并且希望这将减轻日常打水运水的操劳，拯救人们的生命并给予一种受到关怀的感觉，从而有助于创造一个较稳定、较安宁以及最终较人道的星球。

1. 引言：斯德哥尔摩会议后 十年来全球的环境状况

柏拉图曾为古希腊的土壤和森林受到破坏而惋惜，狄更斯和恩格斯曾意味深长地描述过由工业革命引起的污秽不堪的环境状况。而过去二十年，人们对环境质量的关心急骤增加，达到了非常广泛和强烈的程度。

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集中地反映了对六十年代环境的关注。在会议厅内，世界各国政府的代表通过了一系列的法则并投票同意了各种新的世界合作方式。

在会议厅外，数以千计的团体和个人开展了热情洋溢的游说和辩论，显示出在环境问题上市民行动日益增长的力量以及推动这一行动的各种各样的见解。在街道游行队伍中，一个充气的鲸鱼模型，象征着许多人所认为的对自然的不必要的破坏。来自日本俣水镇受到汞中毒摧残的受害者，具体说明了不加管制的工业技术的危险性。

特别是在比较富裕的国家里，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由于环境的实际变化加上人们在感觉上的变化，人们对环境质量发生了新的兴趣。随着致命的污染事件的新闻一个接着一个地披露，有些人担心大气和水污染会失去控制。1962年，雷希尔·卡逊所著《寂静的春天》一书的出版，向许多人介绍了由持久性有毒化学品所提出的各种挑战。航海的著名人士召来了使海洋濒于死亡幽灵；日益衰减的鲸种群，表明人类不能控制其贪婪或尊重同属哺乳类的动物。核弹试验的

放射性沉降物，使人们确信只有一个共同的大气层。对于爆炸性世界人口的种种推测，引起人们的恐惧，担心世界将缺乏食物和资源，甚至连最后一点荒地也将难以幸存。

人们所希望的和可能的环境模式，随着人们想法的改变也在变化。发达国家许多人开始认识到，经济和人口的无计划增长，未必能改进生活的质量。对生态学的深入了解，帮助更多的人重视地球上所有生命之间的相互关系。

最初，第三世界的许多人对富裕带给环境的新贡献，如果不是敌视的话，也是表示怀疑的。为穷国发言的人士说，他们的的问题是工业太少而不是太多；天空出现的一些烟雾，只是为了弥补群众的整个损失而付出的小小代价而已。这些人还说，如果我们存在环境问题，那也只是贫穷的反映：简陋居住区的不卫生条件危害着人们的健康，降低了人类的尊严；穷苦的人们不顾一切的滥加砍伐，把森林夷为平地并使表土受到破坏。

在准备斯德哥尔摩会议期间及其后，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辩论，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扩大了而不是抛弃了正在逐步发展的环境意识。他们也经常被迫按新的方式来考察本国的环境，分析自然条件和人类生活条件之间的相互关系，把考虑重点放在生活质量上而不是放在脱离现实的经济统计上。

斯德哥尔摩会议是七十年代召开的联合国一系列重大会议中的头一个（随后几个会议讨论了人口、食物、女权、沙漠化、居民区、科学与技术等问题），因而热情高涨，充满希望。如果说环境的危险显得很严重，那么，进行全球合作来克服这些危险的希望也同样很大。特别是发达国家的代表创建了新的研究机构来监测全球性的环境趋势，并合作保护海洋和其它全球性的公地。而第三世界的代表则希望得到新